



自「文以載道」 至「沈思瀚藻」

—學術史視域下阮元學圈的
文統觀及其意義



邱 培 超

出版社

自「文以載道」
至「沈思瀚藻」

——學術史視域下的沈思瀚藻
文統觀及其意義



邱培超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自「文以載道」至「沈思瀚藻」：學術史視域下
阮元學圈的文統觀及其意義 / 邱培超著 .-- 第一
版 .-- 臺北市：大安，2012.08
面；公分

ISBN 978-986-7712-55-4 (平裝)

1. 清代文學 2. 文學思想史 3. 文學理論

820.197

101015269

◆ 有版權及著作權 請勿侵權翻印 ◆

自「文以載道」至「沈思瀚藻」—
學術史視域下阮元學圈的文統觀及其意義

著者：邱 培 超
發行人：蕭 淑 卿
發行所：大 安 出 版 社
地址：100 臺北市汀州路三段一五一號二樓
電話：(02) 23643327 傳真：(02) 23672499

劃撥帳號：10103877 戶名：大安出版社

電子郵件信箱：taan1@seed.net.tw

二〇一二年八月 第一版第一刷 001~5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 第三四五九號

定價：新台幣五八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平裝) ISBN 978-986-7712-55-4

自序

清代位居傳統與現代之間，其所呈顯學術之多元、裂變與轉型的關鍵地位，一直深深吸引著筆者。因此本書以「文學」為主軸、為範例，說明清末民初諸多文人學者為之大聲疾呼改良、革命、獨立等口號時，其實早在乾嘉時代的阮元學圈，已為文學獨立發出潛流之音。然而，欲發掘阮元學圈此一重大貢獻，必須在「學術史」視域下方能探得。

事實上，清代學術的發展特色之一，即為學術史視域的出現。清儒透過此視域而有極大的企圖心為各學科區分畛域，釐析經、史、子、文各知識間的界限與區別。因此，當筆者大略梳理了唐、宋至清中葉以前的文學觀，以見「文以載道」之論深烙於學者文人意識之中，無論此「道」所指為禮樂教化之社會功能性，抑或天理、天道之形上義。要之，文以貫道、明道及載道乃為首要宗旨，尤以透過編纂總集的方式，彌益落實並助長其觀念之傳播。然而，阮元學圈的學者面對近千年的桎梏，卻力持六朝之作方可謂之「文」，甚而鉤扶自孔子〈文言〉至明代四書文之文統流脈，其鵠的即欲使文於道學、經學、史學及子學之外，成其為獨立的學科知識，而不盡然是為了駢散之爭而獨尊六朝文。因此，他們以「文筆論」及《昭明文選》為其理論根據，批評備受後世推崇的唐、宋八家之作，認定其內容皆為經、史、子學的知識領域，屬筆而非文。他們因而透過觀念的辨析與宣揚，說明「文」於形式、內容上須具備「對偶」、「用韻」的特徵，並運用華麗的辭藻以抒一己之情性，不應受限於陳規舊法，致力為文學作「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分疏，馴致擺脫文以載道的束縛。其次，他們經由崇祀六朝文人、學

者的方式，以展現其實事求是的精神，宣明其對文的理念絕非蹈空之言。再者，由於〈文選序〉標舉非文不選的原則，故為阮元學圈所重視。在「以字為首出」的學風下，阮元提出「古文小學與辭賦同源共流」的理論，造成《文選》的研究亦深受影響，而具體表現於鈎沈李善《注》，乃至將徐鉉、徐鍇與曹憲、李善並祀之舉。職是之故，清儒也藉此而開啓文選學中的名物制度、宮室車服、草木鳥獸之學的另一學術動向。

阮元學圈的學者不僅反省古文及唐、宋八家的評價，並提倡《文心雕龍》的研究，以及出現文學史觀的雛形，而為民初的文學史家所繼承與稱許，此一功業，皆奠基於學術史的視域下而形成。影響所及，清末民初章太炎、劉師培及黃侃等人，皆繼踵而提出「文以藻績成章為本訓」及「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學」之論。雖則如是，他們終非全盤接收而亦有所轉化，甚至對阮元還有所批評。此時，便進入下一更為複雜多變的文學轉型階段。

本書能夠付梓，最需感謝指導教授何澤恆老師。從字句標點的改誤，乃至整體篇章架構與觀念的修正，皆費心費力地為拙著批讀，令我永銘五內。就學期間，時常去煩擾何老師，而他面對我這樣問題學生卻能百般容忍，且極度耐心地指導我。畢業後，仍願對我在做人處事上諄諄教誨，師恩浩蕩，恆誌於心。又，臺灣中研院近史所張壽安老師，可說是我學術路上最重要的另一明燈。自博三與張老師結緣後，追隨其開課於輔大的三年歲月中，研究視域的開拓、議題的啟發、學術倫理的教導等等，都是張老師帶給我的訓練與學習。至今，仍無法忘懷每次於輔大回程臺北的路途上，與張老師分享與討論清代學術的情景。沒有張老師，就沒有本書的問世。其次，在臺大夏長樸老師的教導與指點下，讓本書論述更加縝密，尤其夏老師是宋代與清代學術的專家，給我相當多的修改意見，培超感激在心。九十八年度我在中研院文哲所擔任人才培育博士候選

人期間以及口試時，林慶彰老師、蔣秋華老師所給予的指導、批評與意見，皆令我獲益匪淺。鄭吉雄老師、岑溢成老師與匿名審查本書的三位學者專家，以及在學術路上扶持培超的師友同好們，都是讓本書更臻完善之最力者，感謝您們。另外，感謝大安出版社的諸位審查教授，同意拙著於此相當具有學術聲望的園地印行出版，更感激陳鳳蛟小姐為本書細心地校對，若無鳳蛟之力，本書勢必有更多的錯漏之處。我相信如此的議題與視域，應可開啓清學研究的另一天地，此或可以中研院文哲所蔡長林先生於本人以《自「文以載道」至「文道分離」—學術史視域下阮元學圈的文統觀及其意義》（臺大中文所博士論文，2011年7月）獲得博士學位後，於同年11月旋即發表〈文章關乎經術—譚獻筆下的駢散之爭〉一文，希冀探討駢散之爭背後的學術史意義可為明證。

最後，感謝家人一路支持我對學術的熱忱而能夠無後顧之憂，同時感激內人怡瑩每每在我挑燈夜戰，熬夜苦讀撰寫論文之時，總是鼓勵並協助我。兒子彥愷的出生，予我相當大的動力。此刻內人與我即將迎接又一個生命到來，恰於此書出版之際，該是上天予我最珍貴的禮物了。

清代學術浩瀚淵深，筆者學識淺薄，疏漏仍多。尚祈前輩方家不吝指正，是幸。

邱培超

2012年8月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本書研究動機與議題的提出 1

第二節 本書研究進路—學術史視域的提出 19

第三節 本書研究對象與範圍 33

第四節 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47

第二章 文以載道—宋明道學影響下的文學發展 63

第一節 「文統」由來及其與「道統」之離合 63

第二節 宋代道學意識下的文學觀 78

第三節 元明至清初道學下的文學觀—以總集編纂為主軸 97

第四節 道學影響下的詩學觀 124

第三章 文麗日月號曰文—凌廷堪的文統觀及學術史意義 131

第一節 凌廷堪的治學態度—時尋學海之源流 133

第二節 鉤沈千年之文統—自屈、宋至六朝 141

第三節 文之特質與經史之別 163

1、麗乎日月號曰文 163

2、文章無成法，達意即為善 170

3、以經史為辭章，有識者猶知非之 180

第四章 沈思瀚藻始名為文—阮元的文統觀及學術史意義 191

第一節 阮元論文與文統 192

第二節 文筆論爭的學術史意義 224

第三節 學術與政治的對話—四書文列入文統之意義 242

第五章 古文小學與辭賦同源共流—阮元學圈

「文選學」的提倡及其學術史意義 271

第一節 明清「文選學」的轉型—以四庫館臣批評為
核心 272

第二節 自評點到考據的轉向—清代「文選學」的再
興與李善《注》的鉤沈 287

第三節 阮元學圈的「文選學」—以〈揚州隋文選樓
記〉為主軸而展開 293

第六章 非偶詞儷語弗足言文—阮元學圈文統觀
的影響與傳承 325

第一節 清中葉以降的學者共鳴 325

1、對《文心雕龍》中經與文關係的省思 325

2、反省古文與唐宋八家 328

3、文學史觀的建立與學術分化 340

第二節 晚清民初的傳承與轉化 346

1、文以藻績成章為本訓 346

2、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學 356

第七章 結論 367

附錄 373

參考書目 39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本書研究動機與議題的提出

有清一代的學術發展，梁啓超（1873—1929）提出「以復古爲解放」之論。¹在經學上，對於漢、唐經注、疏的重視與提倡，皮錫瑞（1850—1908）稱其爲經學的「復盛時代」。²在史學上，大規模將各朝史籍加以考異、商榷與劄記，實爲歷代所無。³子學的復興，更是學界早已認同與關注的大議題。⁴在集部方面亦不例外，劉大杰（1904—1977）認爲：「清代文學具有它自己的時代特

¹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2月初版），頁11。

² （清）皮錫瑞盛稱：「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國朝而復盛。」見氏著：《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8月初版），頁323。

³ 杜維運先生言：「乾嘉時代之史學，卓然超越於前代者有三。一曰徵實之精神，二曰科學之研究方法，三曰理論體系之精密完成。此三者不惟開中國史學之新風氣，亦與西洋近代之新史學（十九世紀歐洲語文考證學派），遙遙相合。……此時期之史學家富有代表性者五人，則浙東史學派之全祖望、章學誠，歷史考證學派之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及立於此兩派之外之趙翼（《廿二史劄記》）是也。」見氏著：《清乾嘉時代之史學與史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4月初版），頁2、5。

⁴ 梁啓超指出：「清儒……其功尤鉅者，則所校多屬先秦諸子，因此引起研究諸子學之興味。蓋自漢武罷黜百家之後，直至清之中葉，諸子學可謂全廢，……及今而稍明達之學者，皆以子與經並重。」（《清代學術概論》，頁52）清儒將沈寂千年的諸子學加以鉤沈，歷經百餘年的研究，甚至將子學與經學並重，其中學術意義值得深究。相關研究可參閱劉仲華：《清代諸子學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初版）。

色。……是幾千年來各種舊體文學的總結，同時又孕育著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的萌芽。」⁵由此可見，清代學術發展場域之廣闊，並非經學或特定某領域所可獨佔。其次，清學並非僅以「復古」為宗，同時值得關注的是「開新」。因此，當我們將研究焦點落於任一領域時，若能關照該領域所展現出傳統與現代的交會火光。或許，當我們重省清代文學或學術思想等研究時，能有一些新的契機與突破。

當筆者撰寫碩士論文《劉寶楠《論語正義》研究》時，已注意到清代揚州學者於學術思想上「尊漢」而「求其通」的特點，⁶亦於經學的成就上大放異彩。同時，有許多漢學家亦為駢文之能手，而於駢文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晚清張之洞（1837－1909）在《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中曾提到：「國朝漢學、小學、駢文家皆深《選》學。」⁷在張之洞所條列的清儒中，漢學家、小學家、「文選學」家及駢體文家有多位是兼具的。⁸近人劉麟生（1894－1980）說明中國駢文的發展時，盛稱清代駢文為「復興期」。⁹研究「文選學」的學者，則指出「文選學」以「唐與清為最盛」。¹⁰學

⁵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臺北：華正書局，1995年7月），頁1145。

⁶ 堪稱第一本專研「揚州學派」的著作，即張舜徽先生的《揚州學記》，張先生認為：「清代學術，以為吳學最專，徽學最精，揚州之學最通。無吳、皖之專精，則清學不能盛；無揚州之通學，則清學不能大。」見氏著：《清代揚州學記》（武漢：華中師範大學，2005年12月1版），頁6。

⁷ 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1月初版），頁352。

⁸ 參見本書附錄（一）。

⁹ 劉麟生：《中國駢文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年9月2版），頁123—144。

¹⁰ 參見駱鴻凱：《文選學》（臺北：華正書局，1978年9月初版），頁42—123。王

術思想上的漢學及小學，文學上的《文選》與駢文，四者究竟有何關連？又為何有此等現象？心常繫之。碩士論文完成後，對此等問題亦追索多年。凡論及此議題之學者，認為駢文與「文選學」所以在清代復興，主因是漢、宋學之爭。漢學家厭棄宋學，而當時宋學的代表人物是以桐城學者為主。由於桐城學者在文學上提倡散文，主張文以載道而欲上承唐、宋八家一系，導致漢學家為與其一爭高下，故刻意提倡駢文及桐城學者所不喜的《文選》，與之抗衡。職是之故，「漢宋之爭」與「駢散之競」竟成了因果關係，二者看似得以結合而有初步結論。¹¹

當我們回顧近一世紀清代學術史的研究，無論是梁啟超的「反動說」、錢穆（1895—1990）的「理學延續說」或余英時（1930—）提出的「內在理路說」，都會碰觸到清代一大論題，即「漢宋之爭」。以漢宋學立場詮釋清代學術史，無論是經學研究，抑或思想史的研究，成果皆相當豐碩。¹²影響所及，文學研究者也

書才亦指出：「清代是傳統文選學的巔峰期。僅視其時出版、翻印或抄寫《文選》一書之繁富、研讀士人之眾多、隊伍之龐大、著作之豐沛、角度之廣泛，便足以見其盛況確為空前。」見氏著：《明清文選學述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1版），頁109。

¹¹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本章第四節「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¹² 研治清學的學者對於漢、宋之爭發生的原因、焦點、結果與影響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不可勝數。從早期將漢學等同考據，宋學等於義理的二者之爭，到近年張麗珠先生認為是義理學內部的漢、宋歧見，而非義理、考據之爭；（見氏著：《清代新義理學》，臺北：里仁書局，2003年1月15日初版，頁121—171。）張循先生認為是漢學自身內部的窮經與進德、考據與義理之間緊張狀態的反映。（見氏著：〈漢學的內在緊張：清代思想史上「漢宋之爭」的一個新解釋〉，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3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3月，頁49—94。）諸多論述，至今仍紛然湧出。本書並非否認其存在的事實，只是想進一步思考，以漢宋之爭解釋其他領域的學術變化，是否確實深刻而貼切，深值反省。

深受影響，紛紛以此為立論基礎而提出己見。然而，若全面檢討此論點所展開的研究，不難發現有部分的基礎點容易遭受質疑，遑論最終所得的結論。例如阮元（1764—1849）曾提出著名的〈文言說〉、〈文韻說〉等數文，最為學界所樂道，大多數的學者都將其置於漢宋之爭的立場下討論。¹³我們以阮元為例，細究其著作，確實在學術立場與治學方法上傾向所謂的漢學家，但阮元卻又有部分言論是支持宋學立場，¹⁴又不盡然是漢學家了。若然，我們輕易地以漢、宋之爭的角度，說明清儒在文學論爭上的一切，於論點上就顯

¹³ 例如馮乾認為：「清代中期，文學界興起了駢文與散文的鬥爭，一時『世之襲徐、庾者誦八家之空疏，而習《史》、《漢》者每譏六朝為摭拾』。駢、散之爭是清代漢學與宋學之爭在文學領域的投影。」見氏著：〈清代文學駢、散之爭與阮元文言說〉，《古典文獻研究》第 11 輯，頁 278—294。又如黃雅雯指出：「漢學派在乾嘉時期極盛，是為漢學家代表之阮元，從小開始接觸《文選》，於是鍾愛《文選》，他提倡駢文，突出駢文正統的地位，而批評、排斥桐城派之古文，意欲與桐城派古文爭文章正宗地位，其種種行徑可謂只是權宜之計，駢文並非其創作的重心，他亦沒有較高質量的駢文創作，他並非真正重視駢文，而是為了宏揚漢學、穩固漢學群體在文章領域的正宗地位。其時以宋學為根底的桐城古文派日益在學術上產生影響力，使得位處學壇中心的漢學界不得不加以正視之。姚鼐編輯《古文辭類纂》，弘揚古文辭，建立古文文統，其目的亦是為了與漢學派抗衡，方苞、姚鼐等人還有著揚宋抑漢的言論。」見氏著：〈論阮元的《文選》研究〉，《輔大中研所學刊》第 21 期，2008 年 10 月，頁 180。類似的主張，可參見本章第四節「前人研究成果回顧」。

¹⁴ （清）阮元於〈論語一貫說〉譏刺宋儒詮解「一貫」之意，說：「聖賢之言，不但深遠者非訓詁不明，即淺近者亦非訓詁不明也。……貫，行也，事也。……皆當訓為行、事也。……若云賢者因聖人一呼之下，即一旦豁然貫通焉，此似禪家頓宗冬寒見桶底脫大悟之旨，而非聖賢行事之道也。」阮元與當時漢學家的治學方法與主張幾乎一致。然而，在〈擬國史儒林傳序〉中對漢學、宋學則兩相肯定，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見氏著：《擘經室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 1478 冊），1 集，卷 2，頁 21，總頁 558；1 集，卷 2，頁 2，總頁 548。另參鄧經元點校：《擘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5 月 1 版），頁 53、36。

得薄弱而易令人起疑。況且，清代漢、宋之爭的實際狀況，是否真有勢不兩立的態勢呢？¹⁵清代漢宋之爭的要角之一方東樹（1772—1851）《漢學商兌》一書，可說是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最強勁的論敵。眾所皆知，江藩與阮元私交甚篤。然而方東樹竟出現在阮元的幕府中，助其編纂《廣東通志》，不寧唯是，方東樹完成《漢學商兌》時，將書予阮元過目，而阮元並助其刊刻該書。¹⁶方東樹在書中對毛奇齡（1623—1716）、戴震（1724—1777）、焦循（1763—1820）及凌廷堪（1757—1809）等人的批判，俯拾即是。方氏對阮元的批評，尤其尖銳。但方東樹與阮元之間的交誼，似乎不因學術立場的對立而不相往來。又如孫星衍（1753—1818），完成《尚書今古文注疏》時，曾贈書予姚鼐（1731—1815）四大弟子之一的管同（1780—1831），管同亦予肯定，回信言：「承惠書併《尚書注疏》，數月始讀畢，其大要在備列古義，而於其說之不安者，復辨正而無曲徇之謬，斯固舊疏所無，而亦惠、王諸君之所莫及已。至其發明，實多人意所不到，讀之躍喜。」¹⁷顯然地，孫星衍此舉並非刻意挑釁，也可見當時兩人之間

¹⁵ 例如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可謂漢學陣營中的佼佼者。然而，錢穆先生指出段玉裁「蓋其心猶不忘宋儒之理學」。而揚州學派中號稱「二劉」之一的劉寶楠，「雖從事漢學，然推崇朱子，絕不蹈非毀宋儒之習」。見氏著：《讀段懋堂經韻樓集》，收入《中國學術思想論叢》（八）（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年11月），頁328、336。對於清代的漢、宋學之爭，是否有勢不兩立之態，可能值得重估。何佑森先生認為：「清代真正的漢學家都有極高尚的人格，也極講求宋儒所討論的心性修養功夫。」見氏著：《清代漢宋之爭平議》，收入《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學術論文集（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4月），頁147—162。

¹⁶ 參考（清）鄭福照編：《方儀衛先生年譜》，收入陳祖武編：《乾嘉名儒年譜》第1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頁384、388。

¹⁷ （清）管同：《因寄軒文初集·答孫淵如觀察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504冊），卷6，頁13，總頁436。關於管同

的學術互動。類似之例，指不勝數。如此說來，清儒果真有強烈的漢、宋之爭，並有勢不兩立的立場嗎？我們並非否定其存在，而是認為有重新檢討的必要。因此，若單純地以漢、宋立場說明漢學家為了與宋學立場的桐城學者一爭正統，故提出諸多理論與學術活動，似乎易使人有不甚滿意之處。職是之故，現今若欲為清代學術史的發展提出新的詮釋，若能將「漢、宋對立而影響甚至決定某一學術領域發展」的成見暫擱一旁，或許能有不同的見解。

平心而論，在清儒的學術成就中，我們可以輕易地在任何文集或筆記中，看到他們對於各知識領域的見解，不僅經學，其他如史學、文學亦多。因此，當我們重新翻閱清人文集時，不但四處可見他們對於「文」的討論，實不亞於其他知識領域的探討，尤其當我們赫然見到清儒論及「文統」二字時，不禁為之訝異。乃因清儒若將「文」加以「統系」而論及「文統」一辭時，是否暗示清儒相當正視「文」本身的發展，因此欲反省、重構文之統系。特別是阮元觀察唐代以降四六文的發展，提出「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的論調，¹⁸我們不禁要思考：何謂「文統」？在「阮元學圈」¹⁹的學者眼中，文是否有獨立發展的系統與軌跡？文

與孫星衍在《尚書》學上的交流，中研院史語所陳鴻森先生於 96 學年度於中央大學開設「清代學術」一課程中亦向筆者揭示：漢學家將自己的著作贈予桐城學者，而二者之間學術上的意見交流與互動中，漢學家有無吸取桐城學者的意見？若有，則有多少的份量？尤其《尚書》文字詁屈聱牙，而桐城學者說經方式又與漢學家小學注經、解經不同，彼此間的影響與互動，乃值得探討的另一議題。

¹⁸ 同註 14，3 集，卷 2，頁 4，總頁 198；頁 608。

¹⁹ 本書採用張壽安先生提出的「阮元學圈」一詞。張舜徽先生論及清代學術曾沿襲章太炎與劉師培等人之論，說明吳、皖二派的學術特徵外，又另加「揚州學派」而成三，其中揚州學派的中堅人物以阮元、凌廷堪、焦循、二王父子等人為主。事實上，阮元等揚州學者也是深受皖派戴震一系的影響。因此本書採用

在歷代的發展中，究竟有何變化與發展？阮元學圈的學者是如何看待這一類的問題？

因此，當我們任意翻閱一本中國文學史的著作，論及魏晉南北朝便謂其為雕麗文風、文學自覺之時代；唐、宋時期則以古文運動為正宗，「文以載道」為號召；元、明兩代的戲曲、小說從萌芽發展乃至成熟大盛；清代文學則似乎呈顯各類文體皆復興的局面。果其然乎？以元代雜劇研究而言，當代學者大致同意中國雜劇的研究起於民初，受西方思潮刺激而興發。同時須明瞭，雜劇文學與文化的流衍，是屬於民間通俗層面，而非元、明時代學界士子們所廣泛接受並研究的對象。²⁰易言之，戲曲為元、明兩代民間文學的首要，但學術界對文學的研究並非以彼等為主流。顯然地，我們向上溯及，唐、宋以降「文以載道」的呼聲，很可能是元、明學術界對文學的要求而深植學界士子之心。

另一方面，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的轉型，在新文學運動中持續進行著。胡適（1891—1962）等眾多學者紛紛提出文學改良、文學革命等口號，知識界正困惑於「文學」的名實，欲為文學正名，追索「何謂文學」的議題，以及批判、反省傳統文學的優劣，在在促

「阮元學圈」之名，乃為突顯阮元在嘉慶、道光以降的學術影響，例如詁經精舍、學海堂等，說明自戴震逝世（1777）後，以阮元為核心，交遊及學術互動所影響的學術圈。因此，本書不欲立兩個系譜，而以此名之。

²⁰ 苗懷明先生指出：「在中國古代，雖然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同被正統文人拒於文學殿堂之外，受到主流社會的歧視和排斥，……具有現代學科性質的戲曲研究始於維新變法後轟轟烈烈展開的文學界革命，在這場運動中，藉助西方思想資源和救亡圖存的特殊文化語境，戲曲、小說等民間通俗文藝受到空前的重視，社會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得以與詩文平起平坐，戲曲研究由此獲得了價值意義上的正當性，被納入現代學術體系。」見氏著：《二十世紀戲曲文獻學述略》（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6月1版），頁1、2。